

一个伟人的

艺术世界

毛泽东诗词注
郭双成 著



浪淘沙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秋风今又是，

人间。

一九五四年夏

(豫)新登字 05 号

一个伟人的艺术世界

毛泽东诗词注解

郭双成 著

责任编辑: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8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91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7801—12800 册

ISBN 7-5348-0640-2/1·261 定价:7.00 元

序 一

我上高中、大学和做研究生时代的老同学郭双成同志，嘱我为他所著的《毛泽东诗词注解》一书作序，却之不恭，只能从命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现代史上和我们党的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时，曾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对于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的一生事业及其思想，进行切实的研究，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所写下的那些诗词，是光辉灿烂的，是会要永远流传下去的。双成同志在其所著《注解》一书中，把毛泽东诗词当作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紧密联系毛泽东同志的一生

事业及其思想，对这些诗词作认真细致的研究，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理解和欣赏，又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者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学素养。我和双成同志相知有年，对于他的为人的诚实和治学态度的谨严，是一向钦佩的。他不仅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又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而且刻苦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二十余年。因此，我认为他是有条件搞好对毛泽东诗词的注释和讲解工作的。今得读他的《注解》一书，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他的这部《注解》，象他的已出版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一样，都不是一时的“内心激动”的产物，而是长期刻苦钻研的成果。“书有自己的命运”，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引用过罗马修辞学者忒伦梯阿努斯·摩乌鲁斯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42页）。《毛泽东诗词注解》一书的出版，对于人们欣赏和理解毛泽东诗词，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是用不着我在这里多所词费了。

于友先

一九八七年十月

序 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双成同志终于著成了洋洋数十万言的《毛泽东诗词注解》（下简称《注解》）。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在感到非常幸运之余，也真的想说上几句，一为应酬老友，二可表示祝贺。

我觉得，这本《注解》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作者在研究毛泽东诗词时，特别注意它的时代背景和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实践活动。这表明，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作者始终都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原理。这正是《注解》之所以具有力度和深度，能给人以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使人感到合情合理、心悦诚服的原因。

这本《注解》的另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作者在探讨毛泽东诗词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时，非常注意它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理论著作的相互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诗词的写作，绝不仅仅是文坛上的所谓“雅事”，往往就是他的理论著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少诗词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常常就包含在毛泽东同志当时或以后发表的理论著作中。因此，紧密结合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理论著作研究和探讨毛泽东诗词，可以说是一条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这本《注解》的第三个很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作者在探讨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时，十分注意它同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民俗心理等等的联系。这样做之所以必要，从根本上说，是

因为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诗词，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沃土之中的。不从这些方面着眼，便不能真正弄清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风貌。本书作者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最后，这本《注解》在研究和探讨毛泽东诗词时，还坚持了务求准确的原则。作者在《后记》中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董仲舒关于“诗无达诂”的看法，认为诗应该有比较符合原意的通达和确凿的解释。这种主张和做法，大大增强了《注解》的科学性。

双成是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老同学。后来，我留校转搞哲学，他留校攻读研究生。从一九七八年起，又同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交往，我是深知双成之为人的。他博学而谦逊。单就搞毛泽东诗词说吧，他就不仅埋头二十余载，潜心钻研，而且也多方向人请教。每有所得，便喜不自胜。老同学在一起，双成总自称是所谓“迂拙之人”，处世应酬，总感无能为力，这是真的。有人说，拙于应酬，自甘寂寞，是潜心于专业者的职业病，我很同意。为使这位“迂拙”挚友的《注解》能尽快为世人所了解，我斗胆写了上面这些话，作为序言，还求方家恕我不自量力。

吕鸿儒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于郑大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双成过早地去世了。临去世的前几个小时，大概是有某种预感的缘故吧，双成躺在病床上，紧紧拉住我的手，一字一顿地说：“要教授，更要长寿！……诗词在你那儿（早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双成就把书稿送给我了，意在要我为他联系出版），能想法早点出吗？……”双成逝世后，友先校友和张桁副校长

都很关心这部书稿。而今，在德富同志努力下，《注解》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双成若有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无限快慰的。作为他的老友，对德富等同志的努力，我是无限感激的，是他们为我了结了一宗我无力了结的心愿。

吕鸿儒

一九九一年三月

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瑰宝

——关于评价毛泽东诗词的几点管见

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的原则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诗词，虽不象上述那样一个问题具有不同寻常的尖锐性和迫切性，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并不一致的看法。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诗词本身固然在经受着时间的严峻的检验，而我们对于它的研究和认识也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有鉴于此，在这本《毛泽东诗词注解》逐首对毛泽东诗词进行注释和讲解之前，笔者就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诗词这一问题概括地谈一些粗浅的意见，想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毛泽东同志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在运用文学艺术这一武器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光辉的毛泽东诗词就产生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列宁说过：“革命理论

并不是谁臆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332页）正如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毛泽东同志个人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产物一样，我们把毛泽东诗词真正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来研究，也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的产物。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在今天仍能赢得如此众多的人们的喜爱，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他的全部诗词是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艺术上作出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概括，是对我国人民进行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艺术上作出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概括，是伟大的革命史诗。在毛泽东诗词中，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上述斗争被毛泽东同志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反映和概括得是如此深刻生动，如此光彩夺目，如此激动人心，使我们不能不为这些诗词所描绘的一幅幅斗争图画的雄奇壮美所吸引，为浸透在这些诗词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感情所感染，从而激起我们勇往直前的无限的精神力量。

我们看到，正是在毛泽东诗词中，极其深刻地反映和概括了我国人民革命力量在几十年的长期斗争中由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夺得胜利的光辉历程。试以收入本书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二十三首诗词（从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贺新郎》到写于一九四九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就以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沁园春·长沙》和《菩萨蛮·黄鹤楼》两首词而论，就凝聚着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心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进行斗争的严峻历史事实。在前一首词中，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提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题，号召无产阶级和

广大革命人民起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命运；在后一首词中，抒发了毛泽东同志面临大革命即将失败时的异常激越的思想感情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是对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厉批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与红色政权的创造和发展，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从《西江月·井冈山》到《沁园春·雪》这十八首诗词是写在这个时期。其中从《西江月·井冈山》到《清平乐·会昌》这十首诗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一篇惊天动地的史诗。从《忆秦娥·娄山关》到《清平乐·六盘山》这七首诗词，是写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毛泽东同志的这七首长征组诗就正艺术地展示了这一真理。《沁园春·雪》这首脍炙人口的词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将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到来时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再一次重申了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主宰历史的不可抗拒的意志，预言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在当时，历史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革命预见发展的。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经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国人民就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写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前一首诗，继毛泽东同志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历史文献之

后，再一次号召全国人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热情激扬地歌颂了埋葬蒋家王朝的伟大胜利。后一首诗，针对着当时柳亚子先生思想上产生的问题，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抒发了他与柳亚子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为我国诗坛留下了一段千秋佳话。

在收入本书的正编和副编的五十首诗词中，从写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和十一月的两首《浣溪沙》到写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和秋天的两首《念奴娇》等二十三首诗词，既有对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歌颂，也有对亲人为革命牺牲和革命战友“不幸离人世”所抒发的歌颂和悼念之情，更有对我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的热情歌颂。综观毛泽东同志写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虽有过曲折，但不管是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在国际斗争中，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诗词是如此紧密地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我国人民进行的国内外斗争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其中的一些首诗词对于其所反映和产生的历史时期来说，是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的。毛泽东诗词之所以理应给以高度的评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有这样一个论断：“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文选》263页）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是这样。

(二)

没有被反映者，当然谈不到反映；但有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作基础到构成一定的文学作品，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列宁《哲学笔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66页）这句曾经被列宁提到过的费尔巴哈的话告诉我们说，艺术来自生活，但又不同于生活，而是经过作家再创造的比生活更为高级的东西。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也是比生活更为高级的东西。毛泽东诗词不但是我国人民所从事的国内国际斗争的雄伟壮丽画图的再现（如上所述），而且也是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的情操、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豪情的光辉体现。而这一切都是和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诗词中成功地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直接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诗人树立了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理应给以高度评价的又一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诗词中是怎样得到体现的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如下两点：

其一，在毛泽东诗词中，对现实的深刻描绘与崇高理想的抒发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担负着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工作，善于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和认识反映发展中的革命现实，了解革命现实的发展方向和我国人民所从事的斗争的要求，这就为在毛泽东诗词中达到上述二者的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念奴娇·昆仑》这

首词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昆仑的“评说”，就很自然地抒发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共产主义理想；《水调歌头·游泳》不但以富于想象的彩笔描绘了正在兴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的雄姿，而且给我们展示了未来更为宏伟的三峡水库的壮丽景象，以致使巫山神女也要为祖国土地上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到惊异，对现实的深刻描绘和对未来远大理想的抒发显然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沁园春·雪》、《七律·答友人》、《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诗词作例子说明这一点，这里就不去详加分析了。

其二，在毛泽东诗词中，对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描写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抒发也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为了推进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前进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异常严重的困难）进行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就一定要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将二者的关系摆对：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而后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诗词是正确处理了这二者关系的典范。例如，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经过的艰难困苦说不胜说，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七律·长征》一诗中却没有去渲染和颂扬这些苦难，而是整首诗昂扬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再如，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首诗词是产生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反对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诗词中并不讳言我们当时处境的困难，然而在其中得到抒

发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却是这些诗词永远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的根本原因所在。邓小平同志又有这样一个论断：“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邓小平文选》158页）对于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反映这一斗争的诗词给以肯定的评价，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历史的事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则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同上，361页）试想在上述这种情势之下，不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怎能顶住来自国外的压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呢？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两点论者，同时又是重点论者，全部毛泽东诗词正是闪耀着这样的思想光辉。

在笔者看来，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诗词中主要就是从上述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个作家、艺术家和诗人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是直接同他们的社会观、政治观、文艺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诗词中给我们树立了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文艺创作的光辉典范，使他的诗词达到了过去任何时代的任何诗人所无法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这无疑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笔者在任何意义上主张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囊括和代替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尽管“两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主要创作方法，但不能把它定于一尊，用它来排斥其他的创作方法，以免妨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多样化发展。

(三)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的第三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诗词是深深植根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土壤中而成长起来的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的艺术花朵。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曾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报刊的逢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以上引文见三联书店出版的该书 196、215、218 页）为了阐明这一点，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论述，这里只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即从毛泽东诗词是怎样运用我国古典诗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有机结合的办法写出来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深刻地总结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创作的规律，明确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同志从我国历代诗歌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在他的光辉诗词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探讨一下毛泽东诗词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按照“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规律进行诗词创作的，而且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诗歌创作经验，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更加发展和繁荣起来。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有自己的特点，更要求

形象的生动、鲜明、含蓄，在表现手法上与其他文学样式也有显著的不同。毛泽东同志在上述论断中所指出的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可以说就是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的显著特点和进行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段。这三种诗歌表现手法，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这部诗歌总集中已有比较广泛的运用^①。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所采取的关于赋、比、兴的说法，出自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在《诗集传》中逐首对《诗经》中的诗进行注解时，对每章诗除注明“赋也”、“比也”、“兴也”以外，有时还注明“赋而比也”、“比而兴也”、“赋而兴又比也”。这说明这三种诗歌的表现手法，或独用，或兼用，而兼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可以看出，即使是叙事诗，毛泽东同志也是不主张只用赋这种手法写诗的，而是赋中要有比、兴。毛泽东诗词都是抒情诗，除运用了赋这种文学的基本手法而外，还特别注意运用比、兴手法，借助于其他事物来作比喻和象征，增强其艺术感染的力量。综观全部毛泽东诗词，就没有一首是单纯采用赋的手法写成的^②。如果从这个角度对毛泽东诗词加以研究的话，很明显地可以区分为如下两类来论述^③：

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些首诗词在采用赋的手法的同时，也采用了比、兴的手法。例如《沁园春·雪》这首词，就总体来说是采用赋的手法，通过对祖国北方雪天景象的描绘和古今不同时代英雄人物的评价，批判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突出当代的“风流人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但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会知道毛泽东同志在表达他上述的思想感情时引人注目地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对于北国雪天的壮丽风光，毛泽东同志就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诸如“山舞银蛇，原驰蜡

象”这些比喻性极强的具体形象加以比况。“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更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把雪霁晴空、红日高照的北国风光比喻作“红装素裹”，从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透过这些形象化的比、兴手法的运用，就使得整首词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更鲜明、更生动、更发人深思，千古咏雪名篇因此而失色，有如群山之退居于珠穆朗玛峰之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在这方面也是很好的例子。上半阙三句：“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开头两句是比，富有象征意味和暗示力量，第三句则采用赋的手法直说。用笔灵活变化，绝不板滞。下半阙三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诗人兴会更无前。”第一句用“比”，以雄鸡的一唱比喻新中国的诞生，二、三句则采用赋的手法直说。因为比喻恰切，使采用赋的手法直说的两句也具有了象征的意味。如果我们拿一些叙事成分更多的抒情诗来看，则我们对毛泽东同志运用赋中带有比、兴的手法抒发思想感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以写于一九二三年的那首赠别杨开慧同志的《贺新郎》词而论，前半阙着重写离别之际的情，“过眼滔滔云共雾”，显然是比。“人有病，天知否？”则是赋中有比了，以“人有病”象征和比喻当时人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词的下半阙着重写离别之际的景。前五句很明显地是用赋的手法抒写毛泽东同志与杨开慧同志在凄清的秋夜分离之景。后五句则是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寄寓着作者对未来革命前景的展望以及对两人必定会在革命大潮中重逢的预期。综观全词，则是情景交融，虚实并举，把作者的革命斗志与对杨开慧同志依依惜别的情怀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一首基本上采用赋的手法写出来的吊唁诗，然而颈联二句“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则是明显地采取了比喻象征的手法，赞扬罗荣桓同志的高尚品格和